

在帝國之外看見精神聯盟——從泰戈爾 的文明視野談印度知識界的一種中國認識*

石 之 瑜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黃 威 霖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余 帛 燦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印度與中國在近代的交往，合作與衝突兼有之。若以古典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觀察，則兩個相鄰而同時崛起的大國勢必走向衝突，而當今印中關係雖仍屢有齟齬，卻能異中求同，跳脫古典理論的僵局。這樣獨特的交往風貌，源於兩個文明古國在吸收近代民族國家理論之前就已有豐厚的歷史與文化視野，產生各種對彼此與對自我的設想。在印度方面，其知識界自詩哲泰戈爾創立中國學院以來便一直以有別於西方現實主義、強調精神文明的觀點來認識中國，但這樣的觀點也使其中國認識不夠全面。而中國出乎其預料的行為進一步帶動知識界的討論，形成今日印度中國研究社群的多元風貌。

關鍵詞：印度、中國、中國學、邊界戰爭、泰戈爾、甘地、文明政治

* * *

壹、前 言

印度與中國都是近年國際媒體所注目的崛起大國，而他們之間的政治關係，也隨著這樣的發展趨勢出現變化，以致於自從 1962 年邊界戰爭以來的緊張關係，在本世紀逐漸緩和，經濟交流快速成長，為兩國高層幾次互訪奠定基礎。因此，就算邊界的爭

* 本文之研究得到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中心與政治學系中國學的知識社群計畫所支助。

議有待解決，但是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發生激烈衝突的機會，似乎不大。^①與古典國際關係理論預期相反的是，原本冷戰早期雙方各自處於相對弱勢的國際權力地位，同屬不結盟國家，卻並沒有牽制他們對疆土劃分的齟齬，居然是在各自國力快速上升後，因而理當會對權力競逐更為敏感的後冷戰時期，兩國竟能存異求同，化干戈為玉帛。相對於此，反而社會建構主義者視為鐵律的歷史路徑，^②即一旦有些個別國家發揮能动性，他們之間國際關係必會從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邁向洛克式的合作交往狀態，有如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印證。

這類出自歐美的國際關係理論，咸以物質力量作為知識探究的依據，不過，早在學者用它們來對當代印中關係加以分析百年之前，其實就已經如預言般地遭到印度知識界的否定。這不只是因為印中之間的所謂國界或邊界地區，從來不存在國際關係理論所預設的相互排斥性，^③更是因為在印中成為國際法上的國家之前，早就有基於歷史與文化且迥異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視野，在引導彼此看待，且在帝國主義近代性輸入之際，產生各種對彼此與對自我的設想，並無關於霍布斯或洛克等當代國際關係理論所奠基的思想。在 19 世紀與 20 世紀之交，印中知識界都在東西文明之間找尋出路，^④其中很大一股警惕西化的力量，同時在兩個社會中形成綿延不絕的主體意識。他們各自對物質文明既嚮往又質疑的態度，影響了印中知識界的自我認識與相互認識，也在冷戰的 20 世紀下半葉與後冷戰的 21 世紀中，繼續發揮規範作用。

雖然當前印度知識界不乏借用主流政治學理論研究中國的作品，尤其是在國防與國際安全相關議題方面，因為受到 1962 年邊境戰爭的影響，採取地緣政治與權力均衡的角度分析中國情勢受到國家經費的支持。這些當代文獻屬於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分析脈絡，對台灣國際關係學界並不陌生，^⑤本文的目的並非全面性的整理印度學界對中

註① 樂觀正面的分析請參見 Jairam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Keshav Mishra, *Rapprochement Across the Himalayas: Emerging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Post Cold War Period (1947-2003)* (Delhi: Kalpaz, 2004)。

註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註③ John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ayal Banerjee and L. H. M. Ling, "Hypermasculine War Games: Triangulating US-India-China," paper presented for Asian Security Facing Hegemony: Nationalism, Immigration and Humanity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June 2, 2006)。(編者按：研討會論文為 pdf 電子檔，故無頁數)。

註④ 本文之後討論到泰戈爾的世界觀，他所從出的加爾各答與孟加拉地區知識系譜自 Rammohun Roy (1772-1833), Swami Vivekananda (1863-1902), Sri Aurobindo (1872-1950) 以降，迭有訴諸精神力量的思想家與行動家。同時期中國日益盛行的是維新之學，但也間有文化自覺意識，如曾國藩 (1811-1872)、康有為 (1858-1927)、熊十力 (1885-1968)。

註⑤ 以此角度出發的相關著作請參考，高一中譯，Stephen Philip Cohen 著，*印度：成型中的強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胡敏遠，「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31~58；陳文賢，「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核武競爭」，*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頁 1~16；劉復國，「印度與亞洲新戰略態勢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4-40；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 年）；柯玉枝，「2002 年印巴衝突中美國的角色」，*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129~144。

國的看法，也不重複印度政府各種現實主義的言行，而是介紹一般現實主義分析所忽略的一個影響知識界的文明視野，藉由角度，回溯上述在當代文獻之前就已經存在，且在未來印中關係復甦之後可能產生影響力，但卻已經不為學術界熟悉的，以印中文明關係為內涵的深層視野，尤其是以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為起點，從他所提的印中兩國共同以文明力量面對帝國主義的主張，解釋獨立前後的印度知識界對中國的想像方式，以及所曾經引起的誤解，並為 21 世紀印中關係的開展，提供更多元的觀察角度。

貳、知識界面對中國的問題意識

長期以來，印度知識界比中國知識界更習於從精神文明的交往關係中，來認識印中關係，早期印度知識分子想到中國，尤其喜歡從唐玄奘取經開始，回溯印度精神文明對當代東亞各國的輸出。^⑥即使佛教後來在印度相對式微，但是這段歷史經驗，支撐印度知識界信仰著冥冥中貫穿印中文明的一種普世精神，能跨越疆界，甚而將看似多元異質的亞洲，乃至於東西對峙的世界，都加以融通。印度曾經這樣對中國文明輸出的歷史認識，主要存在於印度知識界，但在中國知識界少見強調者，也許對中國知識界來說，向來是中原向四方輻射，四方來朝，反而對於日本知識界，文化輸入卻顯得頗為通常，畢竟日本知識史上，在神佛、神儒與儒佛之間，都曾激烈爭議，而到了近代，也像印度知識界一樣，出現了以東洋精神思想貫穿世界的雄心。

中國知識界向來以中國直接面對西方，與印度或日本知識界先結合亞洲，再教化世界的思路不同。但日本後來形成與西方的競爭，一心追求先在物質力的基礎上擊敗西方後，來展現日本的「世界史立場」，^⑦而印中兩地的思想家則始終在物質至上與精神高於物質兩種思路間徘徊。到今天為止，就算印中兩國都成為所謂金磚國家，知識界仍在找尋自身屬於世界文明進程中的妥適位置，並自我警惕不可完全從物質的角度看待彼此。21 世紀浮現的新議程，是如何在精神訴求中，能避免自我中心或一廂情願，於是日本知識界產生以北歐為師的人道與和平精神，^⑧或從亞洲消解中國的區域主義主張，如濱下武志，^⑨中國知識界則出現不以中國為中原的天下體系觀，^⑩至於印度

註⑥ 印度向東亞大陸傳播文明的研究至今未歇，例見 Victor M. Fic, *The Tantra: Its Origin, Theories, Art and Diffusion from India to Nepal, Tibet, M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 (New Delhi: Abhinav, 2003)。

註⑦ 高坂正顯、鈴木成高、高山岩男、西谷啓治，*世界歷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43 年）；更根本的「無的立場」的哲學探討，可參考卞崇道、劉文柱等譯，中村雄二郎著，*西田幾多郎*（北京：三聯，1993 年）；吳汝鈞，*絕對無的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導論*（台北：商務，1998 年）。

註⑧ 1990 年代以後開始流行的觀點，參見 Masako Ikegami-Anderss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Cases of Sweden and Japan*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Pub Co., 1993)；David Arase, "Japanese Policy toward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 *Asian Survey*, vol. 33, no. 10 (1993), pp. 935-952.

註⑨ Takeshi Hamashita, "Tribute and Treaties: East Asia Treaty Ports Network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34-1894,"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no. 1 (2002), pp. 59-87.

知識界普遍對自身中國知識的不足採取反省與建議。

雖然這樣的反省在過去頗為少見，這並不表示印度知識界將拋棄既有認識中國的精神文明視野，畢竟新資訊仍將建立在既有的認識角度之上。既有的認識角度大別之有二：一是探討中國與印度可相互比較的特色，另一是探討中國對印度構成的軍事與政治威脅。這兩種角度可說都是印度中心的，即以印度知識界自身的關懷為前提，各自隱含了親中國與反中國的兩種傾向，也反映了知識界與政策界不同的問題意識。前者關心中國與西方所標舉的普遍發展模式如何不同，以文史哲與宗教學為主，人類與社會學為輔；^⑪後者則傳承由甘地整合並發揚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立場，^⑫並在 1962 年邊境戰爭陰影下集結成一股力量，主要影響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界，窮究中國的國防與外交實力及印度的應對之道。^⑬至於當代印中經濟交流與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等應時課題，正進入起步階段。

印中經濟交流所帶來的新形勢，有助於知識界超越因為 1962 年戰爭所形成的對峙，使得長期在類似中國威脅意識之下的中國研究，取得對中國重新認識的機會。這除了是因為新的交流形勢會促成更深入的研究，因而開展了對官方意識形態與領導人講話文件以外的閱讀，進而注意到包括學術界，網路或其他代表社會勢力的觀點，同樣重要的，是印度社會上對中國知識的需要，再度讓有關中國的研究教學機構恢復活力。1962 年以後成立的中國研究機構難免受到邊境戰爭的影響，而其他較早的中國研究機構在 1962 年後式微，特別是中國語文的學習乏人問津。如今，這些向來重視精神層面的單位，已經又能夠招收到年輕的活力加入，中文再度成為熱門課程。

註⑩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註⑪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42*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78); Manoranjan Mohanty,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ao Tse-tung*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78); Sreemati Chakrabarty,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R. H. Van Gulik, *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2001); Madhavi Thampi, *Indians in China, 1800-1949* (New Delhi: Manohar Books, 2005)。

註⑫ 不過，甘地雖然倡議要透過民族國家來團結印度，但他強調國家建制越小越好，基本上還是要依靠社會的力量，西方曾有學者以“great society of small communities”來形容他的想法，見 James G. Hart, “Recent Works in Gandhi Studie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4, no. 1 (January 1994), pp. 162-163；相對於此，甘地的繼承者尼赫魯則渴望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見 José Arsenio Torres, “The Ideological Component of Indian Development,” *Ethics*, vol. 72, no. 2. (January 1962), pp. 82-83.

註⑬ B. Shyam Sunder, *The Menace of the Dragon* (Maharashtra: Citizens Defence Committee, 1963); J. P.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Bombay: Thacker, 1969); Mohan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73); T. S. Murty, *Paths of Peace: Studies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New Delhi: ABC Pub. House, 1983); M. G. Chitkara, *Toxic Tibet under Nuclear China* (Delhi: A. P. H., 1996); Srikanth Kondapalli, *China's Military: The PLA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IDSA and Knowledge World, 1999); Ramgopal Agarwala, *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Sudarshan Bhutani, *A Clash of Political Cultures: Sino-Indian Relations (1957-1962)* (New Delhi: Roli, 2004); R.V. Phadke,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New Delhi: Manas, 2005)。

中國研究機構中最早的一家，是由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在 1921 年所創建的 Visva Bharati（國際大學）下設的 Cheena Bhavan（中國研究中心），透過中國湖南佛學研究專家譚雲山在 1928 年的加入後，從募款到返國成立中印文化協會，募集圖書，成為印度中國研究的濫觴。^⑭但是 1962 年之後 40 年間，長時期陷入生員不足的情況。如今，印度各界對中國研究的興趣重燃，截至 2007 年，到中國中心就讀的學生已有 100 名左右，專任教師 7 名。^⑮同時，在美執教多年的泰戈爾侄孫泰無量（Amitendranath Tagore）已返回 Kolkata 地區，與其他較師如已退休的 Reena Ganguly，或仍在崗位上的 Arttarana Nayak 及 Hem Kusum 等繼續闡揚泰戈爾的理想，其中著力可說最深入的 Uma Das Gupta 更是經常往返，蒐集泰翁相關資料。中國研究中心的沿革見證印中關係的起伏，也見證了不受政治外交起伏影響的深遠的文化關係。

參、亞洲一體的精神

可能包括泰戈爾在內的眾多早期觀察家普遍都認為，泰戈爾 1924 年的中國之行是一次失敗。泰戈爾首次中國行所碰到的質疑，其實與他之前在日本講學時的遭遇性質類似，他所訴求於東亞主人翁的，是一種具有貫通感化力量的亞洲精神文明，亦即強調善良人性中的超越性與普遍性，更甚於地方精神的獨特性，然而日本與中國的知識界正追逐在西化的潮流中，不但對於儒家或佛家的精神文明失去尊敬，更對桂冠詩人的忠告嗤之以鼻，擔心來自殖民地的哲學會動搖國人勵精圖治的信念。^⑯這樣一股質疑的力量當然在印度也有，因此泰戈爾並不陌生。故泰戈爾雖然有所失望，但是他未受太大影響，對於以精神文明挽救物質文明的理想始終不渝。其實，欽慕泰戈爾的東亞各地知識分子不乏其人，與泰戈爾彼此敬仰的岡倉天心，是一位在 21 世紀又成為日本知識界追憶的思想家，^⑰他主張亞洲是一體，印中文化同為終極性與貫通性的思維，^⑱與出自地中海及波羅的海的洋人文明相較，後者所孕育的對生命特殊性與工具性的執著，岡倉以為是迥然不同，他遂成為泰戈爾的知己。^⑲至於中國知識分子中追隨並傳承

註⑭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25.

註⑮ Arttarana Nayak,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sva-Bharati Cheena Bhavan: A Centre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in M.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Occasional Studies*, no. 15 (New Delhi: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2007), p. 35.

註⑯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pp. 107-111, 226-231.

註⑰ 愛知大學甫推動對岡倉之追憶，召開「東亞共同體與岡倉天心：展望 21 世紀的亞細亞」，2008 年 2 月 25 日。

註⑱ Okakura Kakuzo,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p. 1.

註⑲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pp. 35-42.

泰戈爾的，當首推譚雲山。

譚雲山的例子說明，決定泰戈爾中國行成敗的，不在於愛國青年抵制所造成的一時挫折。譚雲山在 1924 年出海行走南洋之際，就極端注目泰翁的訪華，後來因緣際會在新加坡獲得太翁親炙，自 1928 年起成為 Santiniketan 中國學院的核心人物，替學校募得了以中國佛學與其他宗教、哲學、歷史、文學在內的大批珍貴藏書，開創了以印中關係史研究為內涵的中國研究議程，謂之為印度中國研究的鼻祖亦不為過。不但譚雲山致力於印中關係與中國學的發展，他的後人譚中（1927-）更繼承父業，也在印度執教逾 40 年，協助 University of Delhi 德里大學在 1964 年成立並擔任中國研究中心首任的主持。這是在印中關係最緊張的年代，即使參加針對中共的智庫，其經費來自與美國中情局合作密切的福特基金會，加上其父譚雲山的國民黨背景，且當時華裔受到一些迫害，^⑩但譚氏父子反而更成為印中文化關係的見證。譚中退休後移居美國，繼續推動印中友好，忠貞地發揚泰戈爾對亞洲精神文明的理想。

是什麼樣的精神價值引導著泰戈爾對中國的認識呢？泰戈爾從古代印度文明遍傳亞洲的歷史中，讀出了貫穿亞洲的精神價值，在印度遭到英國殖民的情境下，中國自然成為另一個想必是友善的、不屬於帝國主義的古老文明，這與在印、英之間已經建立的文化聯繫性質大不相同，因此重溫歷史上印中之間的文明交融，成為共同面對帝國主義物質文明的重要基礎。泰戈爾看到印中過去愛與交融的文明紀錄，深信因為物質力量導致分崩離析的世界，會從中得到救贖。^⑪這樣的思路與明治以降的日本思想家一致，不同的只是居間主導的不是日本神道，而是印度文明渴望回歸的一種終極的、貫通的境界。不過，日本近代思想家再謀出路時，確實涵蓋了這樣的思維，包括前述岡倉天心與後來的西田幾多郎。西田受到禪學影響而提倡的無的場所，正是一種退出具體情境以求整合全體的思維，但後來變成要求亞洲各國整合出一種以日本為核心的世界史立場，淪為帝國主義的飾辭。

與日本汗牛充棟的亞洲主義敘事相比，尼赫魯在 1939 年訪華期間，也呼籲成立一個向所有人開放的、有獨立性的東方聯盟，^⑫來介入濫用科學於邪惡而遭致災難的西方，但絕不以西方為敵。印度思想家淪為帝國主義思想的可能性確實微不足道，因為多語言、多種族與多宗教的印度沒有大和民族那種身為神國的想像，相反的，印度知識界很有意識的了解印度宗教、語言、種族的複雜組合；印度也沒有儒家的天下思想，也就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積極性。這使得泰戈爾嚮往的貫通的亞洲精神不具備威脅性，是讓西方物質世界退往休養心靈之所在，因此在西方世界獲得的迴響，遠遠超過在亞洲得到的讚譽。即使到了 21 世紀，西方世界追求心靈解脫者的學習對象中，印度必定名列前茅。縱使在印度社會中，包括致力於印度現代化的政治領導人，在市場上汲汲營營的印度資本家，或新興的消費階層，也都必須面對鄉村湧進如潮水般的都市貧民，他們在國外觀察家難以理解的共生中，受到物質所駕馭的新富

註⑩ 譚中，「尼赫魯送我護身符」，*文明透鏡看萬花筒世界*（台北：海峽，2006 年），頁 418-420。

註⑪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pp. 150-151.

註⑫ 這個東方聯盟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蘭、尼泊爾與阿富汗。

階級，有如印度教神話中雖充滿貪婪與慾望，依舊透過學習與修煉而能浸淫在印度教的精神世界中尋求平靜。^②

早在日中雙方因為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與滿洲國建國對簿國際聯盟之際，印度大使 Aga Khan 的勸和演說，還就是以三國共同的佛教傳統為內涵，想藉著喚醒他們之間在藝術、思想與文學傳統上長期互惠的文明記憶，敦促兩造隨著印度，一同進入曾啓發他們的思想精隨 (the spirit of the thought)，集中透過同一顆冥想的心靈 (concentrate with a single mind upon meditation)，萬萬不可只求一時便宜的妥協，才能謀的持久的友誼。^③這樣的勸說無疑是崇高而優雅的，但是也說明了印度大使訴諸於文明層次的分析，無法具體體會中日之間實際的衝突場景，這其實反映了長期以來，印度對東亞（尤其是中國）發展情況的掌握，除了透過少數商人或英國的上海巡捕，幾乎處於隔閡之中，但印度作家總是回歸到文明交流的高層次去認識中國，並因而對中國充滿希望。不可諱言，日本歐化的成果給予印度各界深刻的印象，而印度自己則接受了英國殖民改造，於是相形之下，現代化程度偏低且對西方帝國主義抱持抗拒的中國，則處於最落後的位置。不過，1903 年泰戈爾在歐洲發表了一篇“Letters of John Chinaman”長文，介紹關於他其實並不了解的中國，盛讚中國人的人道主義、勤勉與家庭傳統。^④從泰戈爾以降的作家，似乎都對於印度竟失去與中國在佛教上的聯繫感到可惜。

不過，相較於泰戈爾的文明視野，印度知識界也受到印度獨立運動影響，以民族國家的角度來思索印度的命運者大有人在，他們回憶印度過去歷史上曾出現的帝國偉業，要透過政治上的行動壯大現代的民族國家去復興過去印度的光榮^⑤。這種採納了民族國家視野的勢力，對於泰戈爾代表的文明橋樑精神有所衝擊，泰戈爾以降對中國文明懷抱的友好情感，可見諸一句當時廣為流傳的口號“Hindi - Cheeni Bhai Bhai”（印度中國親如兄弟），在情感上，印度依然將中國視為東亞的文明知己，^⑥但這樣的情感在

註② Edward Luce,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New York: Doubleday, 2007), pp. 1~6.

註③ League of Nations, *Records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1932*, p. 76, cited from Hindi-Cheeni (the pseudonym of an Indian scholar) in collaboration with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y 18, 1955), p. 4 n. 7.

註④ Rabindranath Tagore, “Letters of John Chinaman,” *The Modern Review* (Calcutta) (April 1, 1942), p. 392, cited from Hindi-Cheeni and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 2 n. 4.

註⑤ 如尼赫魯在其自傳以及印度的發現中提出建立「大印度聯邦」的構想。Malcolm Pitt 對尼赫魯印度的發現評論道：「...the most valuable thing about this book is not fact, but interpretation. Nehru has sought to draw upon the past for his inspiration in the new nationhood of his motherland.」Malcolm Pitt, “Review,”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2 (June 1947), p. 231.

註⑥ 尼赫魯在 1951 年 1 月 12 日：「...We, in India, have had two thousand years of friendship with China. We have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nd even small conflicts but when we hark back to that long past something of the wisdom of that past also helps us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Letter to Chief Ministers*, vol. 2, pp. 276~277, cited from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IGNC &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另外，尙勸余在「國際關係的演化變遷與中印兄弟情誼的大起大落」以及藍建學在「印度大國夢中的中國情結」中說明了國際環境與印度外交考量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他們指出此時中美敵對與印巴衝突對中印友好的促成。

印度獨立後不能落實在雙邊交往之中。50 年代後期，印美關係與西藏問題開始使印、中雙方的外交利益產生裂縫，國際政治中的中國變成印度的對手。1962 年中印戰爭與泰戈爾的中國情懷之間出現嚴重反差，不少印度論者轉而指控中國自始輕視印度，^⑧產生強烈逆反情緒，而有原本表現親華的尼赫魯在 1962 年發表演說謂，「5 年來，我們一直是中國對印度北方邊境線進行侵略的犧牲品。」^⑨其後甚至出現了排華的小高潮，知識界隨之出現關於中國的負面評論^⑩，中國陷入一種外來威脅的印象，且加強了印度政府發展核子武器的決心。泰戈爾自居文明橋樑的自信心，一時間就被印度作為民族國家想要對外展現民族驕傲的願望所抑制，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國如何牽制印度國家地位的警覺，這樣的政治警覺歷久不歇，即至 1998 年對美解釋印度何以堅持核子試爆時，仍引述中國威脅為理由。

在泰戈爾文明印度的視野中，精神文明是印中情誼的基礎。身為民族國家的印度對中國威脅的印象，提供印度政治領導階層思考外交經貿安全等現實處境的依據，但正如泰戈爾所早就斷言，在過去數十年間，民族國家的視野確實帶來兩國之間的暴力，與人心的區隔。在印度分歧的反殖民運動中崛起整合的甘地，透過追求國家民族的平等地位，來團結印度各族人民，尼赫魯繼承了此一追求民族平等的信念，進一步藉由現代國家機器來遂行建國與現代化，並相信中國人民必能同情理解印度，而終至雙方爆發邊境衝突。但另一方面，尼赫魯對於國際大學提倡的精神文明卻依舊眷戀，不願因為衝突而導致排華。這種同為文明古國的親和感川流不息，反省之聲在 20 世紀末已時有所聞^⑪。承續泰戈爾文明情懷的種思想，在 21 世紀再度成為兩國知識界的話題，^⑫文明印度與民族印度兩種意識於是錯綜呈現。

肆、印度中心的中國認識

這可能是泰戈爾對中國誤解的起點，也出現在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註 ⑧ 泰戈爾在中國掀起的旋風，在當時只有羅素可以比擬，除了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青年組織之外，中國知識界普遍喜愛泰戈爾，以泰翁尊稱之，也對印度友好；上海英租界高大溫和的印度阿三當時形象頗佳，上海居民常願意僱用；1949 年易幟後，共產黨也不曾產生負面的印度形象。凡此種種，並非如中印戰爭之後那種中國從來對印度就輕視的印象所描述。

註 ⑨ Jawaharlal Nehru, *We Accept China's Challenge*, Publications Division (1962), p. 5, 引自尹錫南，「一百多年來印度對中國認識的複雜變化」，*南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73。

註 ⑩ 例如 K. P. S. Menon, *China: Past & Present* (Bombay: Asian Publishing House, 1968); S. Chandrasekhar, *Communist China Today* (Bombay: The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R. S. Gupt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4)。在他們的敘述中，中國是一個野心勃勃而不能信任的國家。

註 ⑪ 故謂，「導致 1962 年短暫戰爭的領土問題是由於中印兩國決策者的誤解誤算和理性外交政策的悲哀錯誤造成的。」Surjit Mansingh ed.,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 p. 129.

註 ⑫ 尹錫南，「一百多年來印度對中國認識的複雜變化」，頁 73。

Gandhi) 或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的認知中，甚至涉及邊境戰爭之前雙方的誤解，可以從兩方面比較之。首先是面對情境差異的態度，印中文化都是求同存異，但中國文化更重於求同而後存異，印度文化則存異而後求同。^③在儒家的天下觀中，差異雖然不是自我認識的重點，但天下的秩序是在現實世界中實踐的，因此總有優劣之比。泰戈爾的精神價值則是超越情境的，是一種抽象的人性、通性，因此他可以要求日本與中國知識界不要盲目追求物質力量，而不預期這個忠告會帶來什麼令人焦慮不安的效果，畢竟他是在讚揚中國文化。換言之，他對於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的具體內容不敏感，一心形成一個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前取得尊嚴的亞洲同盟，挽救帝國主義的墮落。他乃從歷史中發掘印中交融的證據，盼望歷史重演。但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處在一個救亡圖存的歷史階段，與印度受到殖民的處境迥異，因此固然有質疑西化的中國文化本位派，但他們反而更抱持反帝國主義的態度。印度學者反省認為 1962 年衝突之前，尼赫魯就一直對於周恩來關於邊境的立場不當真，總覺得印中之間不會有根本的矛盾，最後才鑄成大錯。

其次是關於對人生的態度。^④儒家的聖人是經過修煉而來，居於天地之間，透過個人人格的提升調和天地之間的不順，因此積極地介入社會秩序的整理，因而天地秩序的崩壞，自然世界的災難，都是君子的責任。在中國思想史上與印度思想比較接近的是道家，反對人為的介入，天地與人具有通性，一旦從精神上能回歸到自然，反璞歸真，所承受的災難，不足以成為介入自然界的理由，人為的修煉反而是對自然的破壞。但泰戈爾並不區隔儒家或道家與印度精神文明的差異，而集中對於中日各界積極從事西化，渴求被帝國主義根據帝國主義的標準來認可，加以批評，他尤其反對日本師法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但是他的解藥則是回歸固有的精神文明，至於這個以神道為內涵的固有文明到底能延伸出什麼現代意義，似乎對泰戈爾並不重要，因為他所設想的日本精神文明，終極應該是一種可以超越物質文明的精神，與中國儒家文化的本質應無不同，都是堅忍的、綿密的、深沉的，即使他們的實際教條並不同，但擺脫物質力最後仰賴的，絕不是採取積極的介入或工具性的借用。在這一點上，連甘地都與泰戈爾起了嚴重的衝突，^⑤何況是與中國的愛國主義者。

泰戈爾眼中的中國與印度是沒有距離的，儘管印中之間的文化交流有限，印度知識界了解中國或了解佛教發展的屈指可數，但中國對印度的親近性卻似乎是不證自明的，不像歐洲國家眼中的中國，代表著一個迥異的文明，印度把中國幾乎當成是在東亞大陸上另一個印度而已，是接受過印度文明，但當下同樣受到帝國主義欺凌的文明古國。但是對中國而言，印度卻沒有給予這樣的文明互通的情感，印度是另外一個受

註③ 參見譚中，「印度為何急著要跟中國比？」，*環球時報*（北京），2006 年 8 月 29 日，第 11 版；石之瑜、謝明珊，「西方不在西邊——西方主義的自我認識方法」，*開放時代*（廣州），第 193 期（2008 年 1 月），頁 63-76。

註④ Krishna Prakash Gupta, "Filling Up of Blank Spaces in China and India: Cosmological,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Contexts," *China Report*, vol. 28, no. 1 (1992), pp. 39-55.

註⑤ Stephen N.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pp. 283-285.

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或地方，可以成為中國在追求平等獨立地位的夥伴，中國人或許同情或喜歡印度，但多感覺印度對中國的貢獻可能有限。相對於此，印度知識界後來進一步願意把共產主義主要看成是人道主義，^{③⑥}以便將共產主義納入他的亞洲統一之中，亦即反正都是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差異並不引起好奇。這種對中國的親近感也曾引導著尼赫魯與周恩來談判。

簡言之，雖然印度知識界內部對於個人、社會與國家的假設充滿歧異，但大體來說他們都把中國想像為一個與印度互通的精神文明，使他們後來屢屢無法理解中國的行為反應。尼赫魯與大量印度知識界在 1962 年之後受騙受辱的感覺，與他們把印度想像成居於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之間的橋梁，可以為歐洲與亞洲同時接受，尤其是可以與中國聯合共同挽救世界，息息相關。

伍、對民族國家的抗拒

泰戈爾是有意識的拒絕以西方「民族國家」的形式，來處理當代人類世界的問題。相較於甘地努力將印度團結成民族國家來抵抗西方強權的壓迫，泰戈爾認為解決人類相互壓迫的根本力量在於社會，指出印度與中國文明的動力也在於社會，而西方文明的動力在於國家，因此即使印中兩國歷經多次王朝更迭，社會的動能卻從未消失；相反地，英國殖民者入侵以後，將其政治國家的概念強行植入印度，使得印度人民自發性的社會責任感被破壞，造成整個社會秩序的崩壞。^{③⑦}泰戈爾認為人性中具有超越萬事萬物的力量^{③⑧}，「…人心中的超越自身利益的自我能在與萬物的聯合中找到它的無限真理，使他的行為變為普遍的行為。」^{③⑨}泰戈爾之所以認為社會問題可以經由個人層次解決，原因在於其概念下的個人不是功利主義式的個人，而是一個有能力與他人及自然溝通，以至於合而為一的個人；社會問題肇因於個人忘卻或尚未培養出這種能力，一旦人們能發揮這種能力，社會以至於天地自然間不和諧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由於對個人的假設不同，泰戈爾所設想的社會與社會的改革方案也與西方迥異。在西方，由於啟蒙時代以後承認個人的功利主義計算為「理性」，社會上產生的種種非道德現象也被當作理所當然，因此社會改革的目標就放在維持人為的社會秩序，進而強調制度性的控制手段。相對的，泰戈爾認為正常社會應由具備道德能力的個人組成，故其社會改革必須由個人層面著手；制度改革只能對物質環境的改善有所幫助，不是根本之道。

正由於泰戈爾一方面對民族國家抱持負面看法，一方面又主觀的假設中國文明同

註 ③⑥ S. Radhakrishnan, *Indian and China* (Bombay: Hind Kitabs, 1947), p. 27.

註 ③⑦ Kalyan Sen Gupta,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Hampshire: Ashgate, 2005), pp. 39-40.

註 ③⑧ 泰戈爾認為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在於人有「豐盈的能力」(capacity of surplus)，以追求生理需求之外的精神意義。見 Kalyan Sen Gupta,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p.13.

註 ③⑨ 宮靜譯，泰戈爾著，*人生的親證*，第 4 版（北京：商務，2005 年 6 月），頁 113。

樣是「重社會而輕國家」的，使得他忽視了中國知識界許多人欲建設民族國家以抵抗外侮的強烈企圖，而遭致部分中國知識界的排斥。但泰戈爾的思想之所以又能夠受到許多中國文化界人士的歡迎，原因在於他主張社會動能來自於個人精神力量的解放，這便與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不謀而合。^⑩在泰戈爾的觀念中，個人精神的解放與個人加入群體合作並不衝突，這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的理想之中，群體合作並不需要以民族主義以至於民族國家的形式呈現，只要每個個人精神都超脫，群體的問題就會自動解決，因此要靠教育。可是在當時的中國，成立一個強而有力的民族國家可說是知識界的共識，這是何以雖然泰戈爾的風範在中國知識界受到廣泛的推崇，但在群體層次上對中國民族整體的缺乏關注，則與中國各界的期盼顯得格格不入。

一旦瞭解泰戈爾對個人與社會的假設，我們便能理解為何他會對西方感到失望，又對中國懷抱期望。因為在他的眼中，西方文明在追求國家制度的同時，已然放棄從個人精神改善社會的企圖，但同樣具備精神文明特質、在歷史上又與印度文明頻繁交流的中國，理應與印度有類似的個人以至於社會觀念。但中國的五四知識分子以至於印度的甘地、尼赫魯，都認為建立國家制度是解決當前民族問題的首要之務；個人層次的問題即便不是不必要，也是次要的問題。

陸、1949 年帶來的知識挑戰

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沒有對印度各界看待中國的角度產生衝擊，輿論界一向不會用共產與反共產的兩分法將中共歸類。^⑪印度前總統 Sarvapalli Radhakrishnan 在抗戰期間應國民政府之邀訪華，他當時便提出共產黨是實踐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且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故並不是以俄為師的革命勢力。^⑫戰時象徵印度站在 right（正確）一邊對抗 might（力量）的印度援華醫療團抵華，最後是由朱德邀往延安。事實上，除了在日本尋求庇護的印度革命黨人之外，印度輿論界在泰戈爾與甘地領導下，自始對中國同情無比，對中國抗日的敬佩與半世紀後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成功的敬佩，頗為雷同。因此，即使蔣介石夫婦訪印遊說推持獨立，集中抗日，這顯然是為了英國與中國的利益，甚至違反了印度的利益，^⑬但知識界對中國的同情似乎超越了對個人的看法，也因此可能超越個別的事件或戰爭的記憶。期盼戰後中國終將獨立自主的他們，不但要求美俄雙方停止製造中國分裂，且對國共和解的期盼顯然還高過於國共雙方，印度輿論並將國共矛盾與印度的回印矛盾比擬，藉以

註⑩ 參見艾丹，「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泰戈爾熱』——五四學界對泰戈爾的譯介與研究（1920-1924）」，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1期（2008年），頁61-62。

註⑪ Hindi-Cheeni and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26-38.

註⑫ S. Radhakrishnan, *Indian and China*, p. 27.

註⑬ 甘地拒絕在新德里會見蔣介石夫婦，因此他們必須前往加爾各答，因緣際會也就順道拜訪了西孟加拉的泰戈爾大學，歡迎他們的則是 Amiya Chakravarty 對印中人民文化交流的歌頌。

表達中國應該團結一統的重要性。

中國的政府從國民黨轉向共產黨的過程，對印度起的衝擊有限，因為他們關心的是中國與中國人民，而不是中國各黨各派的命運，雖然內戰造成分裂非所樂見，當一統的價值高於黨派問題則毫無疑問。何況，國民黨與蔣介石在印度本來並不知名，媒體上感謝蔣介石對印度獨立的公開支持，但很難對他個人產生任何情感的投注。^④關心或同情中國並不須要在國共之間產生明顯偏好，畢竟印度各界所反抗的主要是西方帝國主義，而國民黨對抗的，則是印度知識界少有接觸的日本帝國主義，固然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是印度各界的共識，但是日本在本質上屬於亞洲國家，又是佛教傳播重鎮之所在，日本的問題是迷途知返，而不是與西方同質的帝國主義。相形之下，反而共產黨在美蘇之間的折衝，更容易受到注目，因此印度知識界會關心共產黨與蘇俄的關係或與美國的對峙，更關心共產黨的民族主義與反傳統文化主義何者為重或何者為真的問題。對蔣介石的失望與對日本的失望，可以從對新中國的期望中獲得彌補。^⑤

對新中國抱持懷疑的居於少數，他們指控共產黨的統治將人民當成生產工具，監控人民的心靈與生活，壓制西藏的獨立，自外於有色人種，與印度自身的道德文明格格不入^⑥（在 1962 年邊境戰爭之後，他們且變本加厲批判中國）。多數輿論傾向中共，認為新中國代表了突破性的道德倫理實踐，其中許多溢美之詞，不可避免是反映敘事者對印度情況的失望或批判，包括有從中國探測到印度缺乏的所謂私人企業天堂者，或描繪在印度未能有效推動的現代化模式者，因此中共代表的是一種發展路徑，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立場。知識界幾乎是在假定所有開發中國家都面臨一樣的困境，所以熱衷於把他們在中國看到的發展範例推廣到印度，甚至對於印度將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結合的前景產生信心。半世紀以來印度的中國觀察家們，對於儒家或社會主義體系表面的差異都不在意，直覺地認定印中之間存在可以貫通的精神，最後讓他們通往和平繁榮的亞洲團結。^⑦這說明何以 1962 年邊境戰爭令人震驚。

在中共發動所謂自衛反擊戰之後，媒體上充斥了對中國侵略性的描述，輿論界比較流行的對戰爭的解釋分為兩個方向，一是認為中國進入了短暫的瘋狂狀態，二是認為中國既有的侵略性格流露。在政界，左翼的力量受到間接但是相當深遠的打擊。至於知識界，戰爭的影響也頗為深遠，國防研究從此主導了印度的中國研究資源，並且不為社會大眾所能接觸。往後 25 年間，一直到 1980 年代中共開始推動農村改革之前，社會上與中國的往來近於停頓，影響所及，使得知識界對中國現況的掌握缺乏管道，資訊大幅受限，中文人才的培養也益加困難。不過總體而言，各種敘事中散漫著某種隱約的期盼，即相信中國終究有一天會回到與亞洲團結的道路上，繼續揭示某種不與物質文明合流而屬於亞洲的精神範型。關於中國文化大革命情況的辯論，則並沒

註④ Hindi-Cheeni and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 36.

註⑤ Hindi-Cheeni and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p. 40~41.

註⑥ Krishna Prakash Gupta,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I: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China Report*, vol. 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72), pp. 40~41.

註⑦ Krishna Prakash Gupta,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I: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pp. 42~46.

有脫離早先的問題意識，故印中之間的比較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是根據印度的需要，將中國的經驗所透露的差異，當成是做為評價印中優劣的依據，批評印度者傾向稱頌中國的模式，異之則反；二方面是在假定中國與帝國主義有別的前提下，認為中國所追求的目標，是出自中國自身歷史脈絡與發展需要。^⑧

柒、後記：專業研究的濫觴

無論如何，一旦了解到對中國的研究不能陷於印中關係或文化交流的狹隘面向，而必須從整體的中國來了解中國，中國研究的專業化也正是從邊境戰爭之後開始。因此，在專業領域中，左派指控印度政府陰謀發動戰爭，或右派藉機頌揚反共思想，都沒有得到迴響。西方中國學家的線性史觀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史觀，也都不是印度中國學的主要問題意識。二次戰後首先是 1948 年國際研究學院設立東亞分部。1958 年德里大學的佛教研究所開始了中國研究。邊界戰爭的兩年後由 V. P. Dutt 接替譚中主持德里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之後因為加入日本研究改為中國與日本研究系，後又納進韓文的教學，而再改名為東亞研究。另外，1964 年成立的國際研究中心後來併入尼赫魯大學，並設東亞研究所。1991 年，從原本課題研究小組逐漸成長，最後機構化的中國研究所成立。^⑨其他涉入中國研究的機構主要是政策研究與智庫，包括國防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和平與衝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政策觀察基金會（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與政策選擇中心（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

*

*

*

（收件：97 年 5 月 2 日，三審：97 年 7 月 8 日，接受：97 年 8 月 9 日）

註 ⑧ Krishna Prakash Gupta,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I: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pp. 51, 53.

註 ⑨ B·坦克哈，「印度的中國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第 4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16。

In Quest of a Non-colonial Cultural Tie—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Ind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Chih-yu Shih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i-lin Huang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tsan Yu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ups and downs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From the classic realist point of view,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powers is not untypical. However, China and India seem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this realist destiny due to mutual positive images embedded in their rich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are much older than the modern national identity. Beginning fro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his *Cheena Bahvan*,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has prevailed over realism in India's approach to China. However, such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has led to misperception in 1962, as China reacted to India's territorial exploration with force. The national perspective is added to the spiritual perspective since then.

Keywords: India; China; China Studies; border war; Rabindranath Tagore;
Mohandas Gandhi;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參考文獻

- B·坦克哈，「印度的中國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北京），第 4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16。
- 尹錫南，「一百多年來印度對中國認識的複雜變化」，*南亞研究*（北京），第 3 期（2007 年）。
- 卞崇道、劉文柱譯，中村雄二郎著，西田幾多郎（北京：三聯書店，1993 年）。
-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 年）。
- 石之瑜、謝明珊，「西方不在西邊—西方主義的自我認識方法」，*開放時代*（廣州市），第 193 期（2008 年 1 月），頁 63~76。
- 艾丹，「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泰戈爾熱』—五四學界對泰戈爾的譯介與研究（1920-1924）」，*甘肅社會科學*（蘭州），第 1 期（2008 年），頁 61~62。
- 吳汝鈞，*絕對無的哲學：京都學派哲學導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98 年）。
- 尙勸余，「國際關係的演化變遷與中印兄弟情誼的大起大落」，*史學集刊*（長春），第 4 期（2007 年），頁 54~60。
- 柯玉枝，「2002 年印巴衝突中美國的角色」，*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頁 129~144。
- 胡敏遠，「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5 期（2004 年 9 月），頁 31~58。
- 宮靜譯，泰戈爾著，*人生的親證*，第 4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6 月）。
- 高一中譯，Stephen Philip Cohen 著，*印度：成型中的強權*（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
- 高坂正顯、鈴木成高、高山岩男、西谷啓治，*世界歷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43 年）。
- 陳文賢，「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核武競爭」，*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2 期（1999 年 12 月），頁 1~16。
-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
- 劉復國，「印度與亞洲新戰略態勢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4 期（2005 年 8 月），頁 4~40。
- 藍建學，「印度大國夢中的中國情結」，*當代亞太*（北京），第 12 期（2004 年），頁 37~43。
- 譚中，「尼赫魯送我護身符」，*文明透鏡看萬花筒世界*（台北：海峽，2006 年），頁 418~420。
- 譚中，「印度為何急著要跟中國比？」，*環球時報*（北京），2006 年 8 月 29 日，第 11 版。
- Agarwala, Ramgopal, *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Delhi: Bookwell, 2002).
- Arase, David, "Japanese Policy toward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Asia," *Asian Survey*,

- vol. 33, no. 10 (1993), pp. 935~952.
- Banerjee, Payal and L. H. M. Ling, "Hypermasculine War Games: Triangulating US-India-China," presented for Asian Security Facing Hegemony: Nationalism, Immigration and Humanity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June 2, 2006).
- Bhutani, Sudarshan, *A Clash of Political Cultures: Sino-Indian Relations (1957-1962)* (New Delhi: Roli, 2004).
- Chakrabarty, Sreemati, *Mao, China'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Delhi: Sanchar Publishing House, 1998).
- Chandrasekhar, S., *Communist China Today* (Bombay: The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 Chitkara, M. G., *Toxic Tibet under Nuclear China* (Delhi: A. P. H., 1996).
- Dalvi, J. P., *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Bombay: Thacker, 1969).
- Fic, Victor M., *The Tantra: Its Origin, Theories, Art and Diffusion from India to Nepal, Tibet, Mongolia, China, Japan and Indonesia* (New Delhi: Abhinav, 2003).
- Garver, John,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ulik, R. H. Van, *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New Delhi: Aditya Prakashan, 2001).
- Gupta, Kalyan Sen,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Hampshire: Ashgate, 2005).
- Gupta, Krishna Prakash, "Filling Up of Blank Spaces in China and India: Cosmological, Historical and Architectural Contexts," *China Report*, vol. 28, no. 1 (1992), pp. 39~55.
- Gupta, Krishna Prakash, "Indian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a—II: A Socio-historical Analysis," *China Report*, vol. 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72), pp. 40~53.
- Gupte, R. S.,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China*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1974).
- Hamashita, Takeshi, "Tribute and Treaties: East Asia Treaty Ports Network in the Era of Negotiation, 1834-1894,"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 no. 1 (2002), pp. 59~87.
- Hart, James G., "Recent Works in Gandhi Studie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4, no. 1 (January 1994), pp. 162~163.
- Hay, Stephen N.,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Tagore and His Critics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indi-Cheeni and D. Amba Bai, *Indian Views of China Before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y 18, 1955).
- Kakuzo, Okakura, *The Ideals of the East* (Tokyo: Kenkyusha, 1941).
- Kondapalli, Srikanth, *China's Military: The PLA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IDSA and Knowledge World, 1999).
- Luce, Edward,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New York:

- Doubleday, 2007).
- Mansingh, Surjit ed.,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8).
- Masako, Ikegami-Andersson,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The Cases of Sweden and Japan* (Aldershot, England: Dartmouth Pub Co., 1993).
- Menon, K. P. S., *China : Past & Present* (Bombay : Asian Publishing House, 1968).
- Mishra, Keshav, *Rapprochement Across the Himalayas: Emerging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Post Cold War Period (1947-2003)* (Delhi: Kalpaz, 2004).
- Mohanty, Manoranja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ao Tse-tung*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78).
- Murty, T. S., *Paths of Peace: Studies on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New Delhi: ABC Pub. House, 1983).
- Nayak, Arttatrana,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Visva-Bharati Cheena Bhavan: A Centre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in M. Thampi ed.,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in India: A Colloquium, Occasional Studies*, no. 15 (New Delhi: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2007), p. 35.
- Phadke, R.V., *China's Power Projection* (New Delhi: Manas, 2005).
- Pitt, Malcolm, "Review," *Pacific Affairs*, vol. 20, no. 2 (June 1947), p. 231.
- Radhakrishnan, S., *Indian and China* (Bombay: Hind Kitabs, 1947).
- Ram, Mohan,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 1973).
- Ramesh, Jairam,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2005).
- Sunder, B. Shyam, *The Menace of the Dragon* (Maharashtra: Citizens Defence Committee, 1963).
- Tagore, Rabindranath, "Letters of John Chinaman," *The Modern Review* (Calcutta) (April 1, 1942), p. 2.
- Tan, Chung ed., *A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 IGNCA & Gyan Publishing House, 1998).
-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Opium War 1840-42*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78).
- Thampi, Madhavi, *Indians in China, 1800-1949* (New Delhi: Manohar Books, 2005).
- Torres, José Arsenio, "The Ideological Component of Indian Development," *Ethics*, vol. 72, no. 2. (January 1962), pp. 82~83.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